



国际名流与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丛刊

上海图书馆 编

近代上海

The Overseas Celebrities in

Modern Shanghai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际名流 近代上海

执行主编：张 伟

编 撰：张 伟 严洁琼 解舒匀

周 渊 熊欣杰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 / 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439-4496-1

I. ①国... II. ①上...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
-世界-近代②文化史-史料-上海市-近代IV.
①K815.4②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9462 号

责任编辑: 倪文君

封面设计: 何 旻

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

上海图书馆 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2.75 字数 595 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4496-1

定价: 168.00 元

<http://www.sstlp.com>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丛刊》编委会

主 编：吴建中 周德明

副主编：黄显功 陈建华 陈先行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仁芳 王 宏 仲 威 张 伟

张品芳 胡 坚 郭立暄 高洪兴

梁 颖 樊兆鸣

序

上海是一座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从1843年开埠起,上海就逐步确立起开放型城市的性格,外来资本的注入和移民社会的形成让上海逐渐成为一座具有现代化意味的国际大都市。不同肤色和国籍的人们汇集在上海这块新开发的热土上,共同构建了上海既传统又西化的现代都市文化。这期间,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和在世界范围内相对发达的文明程度使得上海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海外游客慕名前来。在这些访沪的人群中,从来不乏世界各名流的身影。罗素、杜里舒的讲学曾让国人如醍醐灌顶;泰戈尔、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引起的争议一度掀起激烈笔仗;海菲兹、鲁宾斯坦、夏里亚宾送来艺术的高度;萧伯纳、卓别林、范朋克制造出电影盛事般的轰动;毛姆、芥川龙之介、横光利一笔下的作品流泻着中国印象。他们都曾来过这里。在上海这座敞开胸怀面向世界的城市,一度有英、美、俄、法、德、日等多种文化的输入和传播,多元的文化酿造出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不同流派的学说,不同风格的艺术,都能在此找到听众,获得共鸣。这是一个开放的港口,海纳百川的气度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上海文化的一部分。

近年来,近代国际文化名流对上海的造访这一课题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上海图书馆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组织历史文献

中心“上海年华”项目组成员,从大量近、现、当代馆藏的中西文报纸、期刊、专著中寻找线索、汇总资源、钩沉史料,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编撰成《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一书。本书以近现代访问上海的国际文化名流个体或团体为研究对象和单元,充分发掘其与近代上海的历史渊源,合成研究报告总计 24 篇,且每篇皆附有参考文献、原始文献摘录以及相关的图片资料,以严谨规范的治学方式和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阐述了每位名流访问上海的事件始末及其影响,许多史料和图片均是首次披露,弥足珍贵。《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的出版是对馆藏历史文献进行深层开发的有益尝试,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丛刊”的又一部力作。

上海图书馆在对馆藏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坚持与时俱进、从社会需求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原则。如在 2002 年上海申办世博会之际,推出了《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在 2005 年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时,编纂了《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目书志》;在中国话剧百年华诞之时,整理出《中国近现代话剧图志》。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圆满落幕让整个世界领略到了今日上海的卓越风华。值此后世博时代,《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一书的出版将让读者重新发现中外现代文化交流的前世今生,这不仅是对昔日上海与世界文化往来的一场追忆、一次总结,也是对受到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今时上海文明的一种寻根,一段回顾。

吴建中

2010 年 12 月

目 录

导言：国际名流的上海踪迹 / 001

凯泽林：末代贵族的微弱叹息 / 008

谷崎润一郎：与上海的两次亲密接触 / 029

毛姆：在中国屏风外 / 059

罗素：中国的问题和答案 / 081

芥川龙之介：抵达——恍惚的不安 / 114

霞飞：申城旧事 / 140

桑格夫人：节育运动西风东渐 / 166

杜里舒：在哲学与科学之间 / 196

克莱斯勒：造访“中国花鼓”的故乡 / 217

伊巴涅斯：熟悉的陌生人 /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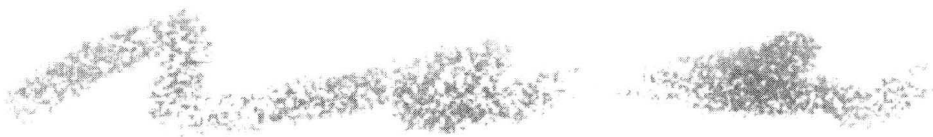
泰戈尔：鲜花与荆棘之路 / 266

柏克赫司特：翘首等待道尔顿制创始人 / 316

丹尼肖恩舞蹈团：春申江畔的现代舞先声 / 355

莫斯科邓肯舞蹈团：向着欢乐与光明 / 378

蒂博：倾听法兰西之味 / 401



横光利一：新感觉派与“上海情结” / 427

奥尼尔：双重误读 / 447

范朋克：啼笑因缘 / 472

华虚朋：姗姗来迟的文纳特卡制 / 512

海菲兹：“神弓”的东方背影 / 543

鲁宾斯坦：漫漫东行路 / 570

夏里亚宾：伏尔加船歌唱响上海 / 597

卓别林：上海一夜 / 622

奥登：诗歌——开满战地之旅 / 650

导言：

国际名流的上海踪迹

——近代上海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特殊视角

张 伟

1843 年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和传播中心。这里集中了全国最早、最多的中、外文报刊和翻译出版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艺术活动中心，电影、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等，均占全国的半壁江山。西方文化在这里合作竞争、交汇融合，共同谱就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格局。从 19 世纪末开始，上海已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区域内最繁华、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大都会，并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等城市并驾齐驱，跻身于国际性大都市之列。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全国的 18 个行省，也来自世界各地。无论就侨民总数还是国籍数而言，上海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中都独占鳌头；而且，和其他城市受相对单一化的外来族群文化影响不同（如香港主要受英国文化影响，哈尔滨主要受俄罗斯文化、大连主要受日本文化、青岛主要受德国文化影响），作为世界多国殖民势力争相聚集之地的上海，它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是综合性的。仅以近代建筑为例，既有大量明显带有英、德等国新教传统色彩的，也有法、意等拉丁文化为代表的天主教传统风格，更有所谓“芝加哥学派”风格的美国现代主义建筑，此外，日本风格、犹太风格、俄罗斯风格、北欧风格的建筑也比比皆是。所以，当时的上海，堪称一座融汇多元文化表演的大舞台，不同肤色的族群在这里杂处，不同文字

的报刊在这里出版发行,不同国别的货币在这里自由兑换,不同语言的广播、唱片在这里录制播放,不同风格流派的艺术门类在这里创作演出。这种人口的高度异质化所带来的文化来源的多元性,酿就了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并催生出充满活力的都市文化形态,上海也因此成为多元文化的摇篮。

这些因素决定了上海具有大量异于其他城市的独特之处,而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汇碰撞,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点。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历史上,有一个亮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这就是上海与世界文化名人的关系——上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对上海的回应。追溯往事,众多享誉世界各领域的国际名流都曾与上海有过渊源,有的长期讲学,有的短暂造访,有的进行商业演出,有的屡次应邀参观,如爱因斯坦、马可尼、罗素、杜威、泰戈尔、毛姆、芥川龙之介、萧伯纳、海菲兹、鲁宾斯坦、夏里亚宾、卓别林、范朋克等等。这串响当当的名字背后都蕴藏着一段段值得深思回味的往事。它们折射了上海城市传统中最值得弘扬的精神:尊重科学、崇尚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尤其在现今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的氛围里,这些西方文化泰斗级人物访问上海的史迹,自然更应被赋予丰富的文化涵义。充分发掘这些史迹,既有利于展示上海曾有的风韵和深沉的文化底蕴,也有利于让世界了解上海。

基于这样的认识,“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课题,被纳入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的项目框架内。对此,我们进行过充分的论证。从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中期这近百年时间里,踏上过上海土地的世界各国名人多如过江之鲫,难以尽数。其中,享有世界声誉的国际名流,据我们统计,也起码在百位以上。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财富,也是一笔值得深入发掘的文化宝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项文化遗产却远远不够重视,仅仅是一份比较粗略的来访者名单,也无一家机构能够拿得出来;至于研究方面,更几乎是一片荒芜之地。2006年,《文汇报》推出“国际科学文化名人与上海”专栏,试图发掘上海的优秀文化历史遗存,集中展示上海的城市形象和魅力。但限于文献的匮乏,从爱因斯坦到卓别林,共发

掘了7位大师与上海的因缘关系后就无法持续了。几乎同时，另一家重量级媒体《新民晚报》也以“重绘国际名人上海足迹地图”为题，推出了两期专题报道，但在简略介绍了杜威、罗素、卓别林、马可尼等13位世界名人造访上海的历史后，也因难以为继而宣告中止。由于基础史料的不明朗，更多的机构都只能知难而退。我们之所以涉足这一领域，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一课题充满魅力，富于挑战性。其次，我们有长期的积累储备，手中握有一份来访者的基本名单，因而胸有成竹。最后，上海图书馆在历史文献开发方面具有悠久传统，而上图丰富的馆藏则为课题的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们在着手工作之前先进行了务虚，确定了几条原则。首先，我们要求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避免简单化与单向性的思维，坚持运用综合的尺度，注意以多元的价值标尺去分析、解读、点评处在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处在中西两种文化撞击的背景中的历史人物的心理、心态、情感与价值观及行为模式。其次，在历史学的三个空间（物理空间、地理空间、人文空间）中，要特别注意对人文空间的开掘，诸如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氛围、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来访者的地位影响、欢迎或反对阵营的不同背景等等，避免将丰满的人物置于单一、苍白的环境氛围中。第三，对中西两种文化，要注意从两方面去观察，既要看到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不能忽视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共处。在写作方法上，我们也设想了几种可能：第一，相关文献史料都还清晰，但由于时代和理论的局限，对这一人物及其活动和产生的影响理解不够、解读有误，这就需要有睿智的眼光去重新发现。何谓发现？即随着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以新的观察视角对其进行思考，进行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问题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发现中不断地进步着。第二，发现新的文献史料，一经提出足以引人瞩目，甚至颠覆以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一切历史皆史料。虽然不无偏颇，但也足见史料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要求大家从最基本的史料收集、文献考证做起，一切凭资料说话，不发空头言论。第三，以往史料文献皆在，但却芜杂不清：或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或来源不明。对此要

进行梳理,就像理一团乱麻一样,从中理出头绪、理清脉络,使各节材料各得其所、相互印证,有些错的、伪的史料则要一一剔去,还历史以真相。这里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国际巨星卓别林 1936 年曾经在周游世界途中踏上过上海的土地,其在沪行程满打满算只有 26 个小时,但就是这短短的 26 个小时,卓别林的行程安排可谓丰富,几乎是连轴转,不浪费每一个时辰。卓氏访华在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件引人瞩目的盛事,当时就有上百篇文章记述卓氏的访问,这股余波甚至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在重视城市记忆的今天,仍有无数篇文章重谈这件往事。但遗憾的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几乎每篇文章在基本事实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错。由于卓别林显赫的身份地位,当年绝大多数记者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难以接近他,再加上卓氏对自己活动的一些可以理解的保密措施,故很多报道都不免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甚至张冠李戴,指东为西;至于几十年后的相关记述,更是懒得再去查考,只是找寻下载一些自认为权威的记载转抄发挥。我们在仔细阅读中发现,这些记述依据的几乎都是梅兰芳的叙述。梅氏和卓氏关系密切,又是当年参与接待的亲历者,他在 1962 年出版的《我的电影生活》一书中详细回忆了卓别林访华的具体经过^①。照例说,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这份回忆的可靠性应毋庸置疑。但恰恰就是这篇权威记述,写作时已事隔二十余年,具体材料也是别人搜集提供的,整理成文又出自他人之手,故其中的一些细节,诸如卓氏访华的时间、参观活动的地点、某些活动自己是否出席等等,都与事实相差甚远,一些活动过程的记述也有互相错位。而以后的不少“怀旧”文章,大都以此作为基本文献的蓝本,其错讹程度当然是可想而知的。类似这样的错误,不仔细研读大量第一手文献是难以发现的,而我们这次项目的完成,在史料文献上的自信,正是建立在这样高强度的仔细研读、认真辨析上的。

国际名流的访问,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有的直接影响到某些重大事件的进程,而更多的则是对一些具体人物长久

① 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 年版。

而深刻的思想浸润。如世界男低音之王夏里亚宾 1936 年来中国进行了访问演出,事后有很多中国文化名人撰文谈到夏氏当年的演出对自己产生的震撼。如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指挥大师的李德伦,当时还在读高中,知道夏里亚宾要来演出,便饶有兴趣地去听了,在他看来,“听过夏里亚宾的独唱会是生平幸福事”^①。日后成为名剧作家的曹禺,当时还在大学读书,也凑钱去听了夏里亚宾的演唱,并一直对此记忆犹新:“他的《船夫曲》唱得深沉、深厚、有力,令人神往。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绝顶的歌唱。西洋音乐给我以很好的影响。”^②这种震撼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特别是一些享誉世界的大家巨匠亲临献艺,那种直逼心灵的震撼是很多人终身难忘的。小提琴演奏大师海菲兹 1931 年到上海演出时,聂耳就曾早早到剧院门口等候,并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我崇拜他,我爱他,我心里一团莫名的热火在燃烧着。”^③英国著名诗人奥登的诗风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影响很大,史称“奥登一代”。这种影响当然也蔓延到中国。1938 年他访华 5 个月,足迹遍及重庆、武汉、上海等地,回去后写了那本脍炙人口的《战地行》,其对 40 年代中国诗坛的重大影响,今天已有很多人在进行研究。至于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中国流行歌舞,以往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外国歌舞对他们的影响,而实际上,1927 年中华歌舞专门学校的成立就与邓肯舞蹈团、丹尼肖恩舞蹈团等当年的访华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黎锦晖自己也承认:开设舞蹈班、排练大型舞剧,“这些进展,是由于在近年内观摩了‘丹尼肖’、‘邓肯’等大型舞艺团体的演出”^④。

“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这个课题历经两年,目前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共收录研究 24 位国际名流(团体)与近代上海关系的考察报告。每份报告各成一个独立系统,每个系统都由四个部分组

① 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 年版。

②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版。

③ 《聂耳日记》“1931 年 11 月 25 日”,大象出版社,2004 年版。

④ 黎锦晖:《回忆‘中华’和‘明月’两个歌舞团的舞蹈》,载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一书“附录”,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版。

成:第一部分是一篇研究文章,大约万字左右,分析解读其人其作对中国的影响,并回顾介绍其访华的全过程。第二部分为原始文献附录,选录当年重要的新闻报道,本人及他人日记、书信、演讲、游记等作品中的相关部分,他人的评述研究等等,目的在于充分还原当年的氛围。^①第三部分为参考文献,旨在给大家提供一份相关专题的重要文献名录。第四部分是图像文献,包括照片、绘画、书信手迹、书刊封面、报刊版面等等。上述各部分最后将整合在一起,除出版纸质文献外,还提供上网阅览,并接受专题咨询。课题内容也将视情逐步扩充,使之成为一个完善的数据库。

“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这个项目,是我们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并深度开发的一个尝试。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散发着属于自己的气质,那是时间、空间的共同累积。我们希望通过上海历史这一独特层面的回顾,在那份积累里添上我们的一份微薄力量!

《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收录人物(团体)名单

姓名	国籍	身份	访华时间
凯泽林	俄罗斯	哲学家	1912年初
谷崎润一郎	日本	作家	1918年10月;1926年1月
毛姆	英国	作家	1919年12月
伯特兰·罗素	英国	哲学家	1920年10月
芥川龙之介	日本	作家	1921年3月
约瑟夫·霞飞	法国	法国元帅	1922年2月
玛格丽特·桑格夫人	美国	世界节育事业创始人	1922年4月;1936年3月
杜里舒	德国	哲学家	1922年10月
弗里兹·克莱斯勒	奥地利	小提琴演奏家	1923年4月
伊巴涅斯	西班牙	作家	1924年1月
泰戈尔	印度	诗人	1924年4月
柏克赫司特	美国	教育家	1925年7月

^① 近代文献中不少字词的使用方法与当前的汉语语言文字规范有出入,对于外国人名、地名等的翻译也五花八门。本书在收入这些文献时,尽可能地不做改动,以展现史料的原貌;仅对明显的错字、衍字或会引其歧义的文字予以修正。

丹尼肖恩舞蹈团	美国	舞蹈家	1925 年 10 月
莫斯科邓肯舞蹈团	苏联	舞蹈家	1926 年 11 月
雅克·蒂博	法国	小提琴演奏家	1928 年 4 月
横光利一	日本	作家	1928 年 4 月;1936 年 2 月
奥尼尔	美国	作家	1928 年 10 月
范朋克	美国	电影演员	1929 年 12 月
华虚朋	美国	教育家	1931 年 2 月
亚沙·海菲兹	美籍犹太裔	小提琴演奏家	1931 年 11 月
阿·鲁宾斯坦	美籍波兰裔	钢琴演奏家	1935 年 5 月
夏里亚宾	俄罗斯	男低音歌唱家	1936 年 2 月
卓别林	英国	电影演员	1936 年 3 月
奥登	英国	诗人	1938 年 2 月

凯泽林：

末代贵族的微弱叹息

1912年5月3日，沪上颇负盛名的英文报纸《大陆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条题为《东方·西方·碰撞与比较》(*East and West Are Compared in Lecture*)的新闻报导，详细记述了俄国哲学家赫曼·凯泽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于知名集会场所尚贤堂开堂宣讲之盛况，并全文附录其艰涩深奥的演讲稿。这篇讲稿洋洋洒洒万余字，细述了西方哲学发展轨迹，概括了东方哲学特点，并探究了结合东西哲学解决人类困境的新途径。



凯泽林家族族徽

这位备受瞩目的凯泽林伯爵究竟为何方人士？来中国所为何事？又具有怎样高瞻远瞩的见解，值得国人侧耳倾听？时人对此并不十分清楚，《大陆报》也只简单介绍了一句“这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研究哲学的学者”^①，其实，凯泽林家族在俄罗斯可谓显赫。赫曼·凯泽林是爱沙尼亚的一位世袭伯爵，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在历史上曾数次被列强瓜分，而早在13世纪爱沙尼亚首

^① 参见《大陆报》1912年4月26日报道。

次划为德国属地时，凯泽林家族就已经拥有了贵族封号，其先人中有一位还是巴赫创作《布兰登堡协奏曲》的委托人。爱沙尼亚被俄国占领后，凯泽林家族依然尊享荣耀，祖父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顾问，祖母则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财政大臣乔治·坎卡林伯爵的女儿。凯泽林从小在贵族环境下长大，青年时代游学于欧洲各国，及至读了豪斯顿·张伯伦《十九



凯泽林肖像

世纪的基础》一书后，才矢志攻读哲学。“凯泽林的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非学院式的。其思想集中于精神新生这一主题。其主张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甚为流行。”^①他首创了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planetary philosophy)，兼采各家之长，化为己用。在他看来，哲学并非仅只为了了解世界、解释世界，更要致力于人类自身的完善。以此为信念，凯泽林于1920年在德国创办了智慧学校(School of Wisdom)，旨在教育学生如何在欧战废墟中重建精神世界。

而促使凯泽林形成松散哲学思想的重要契机则是他从1911年开始的环球旅行，在与各民族文化的直接精神接触中，他逐渐摒弃了欧洲学者惯有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成分。这次旅行也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The Travel Dairy of A Philosophy*)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这本书中，凯泽林详细记叙了自己的旅行经历及对各国哲学的认识，其中也包括中国。他抵达中国之时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敏感时期，中国未来会走向何方是当时有识之士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凯泽林被邀请至尚贤堂做客演讲也正是在此氛围中催生的，虽然他的部分见解与当时激荡的革命风潮背道而驰，以至于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然而时过境迁，回头看去，却依旧折射着智慧之光。

①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